



□ 郑归初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核心理念，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崇高目标。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一重要思想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和国际地区组织合作文件，受到国际社会热烈欢迎，日益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考察和评价一种理念和思想是否先进，一个重要方面是看其在应对危机挑战中能否提供科学的研判和有效的指导。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全球抗疫行动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性得到充分彰显。

时代性体现在对世界大势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研判。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什么是当今世界的大势？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国际形势，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走向，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事实证明，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是近邻还是远交，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和迅速蔓延，波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疫情告诉我们，人类已经从全球化时代进入共同体时代，那种想要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甚至落井下石的想法，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再一次深刻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眼光、前瞻思维和现实意义。

时代性体现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指引了科学路径。任何科学思想都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但动荡、冲突、失衡的一面也十分突出，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环境污染、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

严峻挑战。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回答：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理念的核心就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旨在解决我们这个星球面对的各种全球性挑战，为在和平与发展的跑道上奔跑的人们指明方向、明确路径、注入能量。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也造成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环球同此凉热，更应风雨同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唯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抛弃各种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差异，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加强团结，形成合力，才能在这场全球战役中取得最终胜利。

时代性体现在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价值理念和实践方案。全球治理因全球化而生，但近年的发展日益跟不上全球化的步伐。特别是近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发酵，发展空间不平衡等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世界正面临治理、信任、和平、发展四大赤字。对此应如何破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二十国集团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重要论述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的思想引领和中国方案。

国际公共卫生界有句名言：“疫情的发生不可避免，但疫情的扩散却可避免。”疫情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善恶美丑，照出了各国政治生态，也照出了全球治理特别是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短板。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全球合作。我们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发布数版诊疗和防控方案，译成多语种与各国分享；向世卫组织提供2000万美元捐款；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专家视频会议，与各国同行交流一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咬定目标、坚持标准，一鼓作气、乘势而上，保持攻坚态势，强化攻坚责任，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实现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县全部摘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高质量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坚持现行脱贫标准。对标“两不愁三保障”，既不拔高也不降低，既不抢跑也不拖延，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聚焦“三保障”，抓紧抓实控辍保学、免费健康体检以及11.78万结核病患者诊疗救治、1.53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等工作。

攻坚克难挂牌督战。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工作难度大的县和村挂牌督战”的重要指示精神，采取“自治区督战到县、地县督战到村、干部分包到户”的方式，由24位省级领导干部督战剩余10个未摘帽贫困县，由相关地（州）、县（市）领导督战剩余559个未退出贫困村，确保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

线诊疗经验；派出医疗团队赴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柬埔寨等国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向120多个国家和40个国际组织提供紧急援助……在3月26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点倡议，从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为全球协调行动抗击疫情指明方向。全球抗疫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清晰具象，中国担当使得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时代性体现在对中西方文化理念和价值追求的融会贯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文化根源和基础，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的“天人合一”“和合共生”“世界大同”等理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情怀与中华文明天下情怀的融合体现，与人类其他文明的价值追求也是精神相通的。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曾说过，“我们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拉丁谚语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南部非洲有乌班图思想等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世界共筑防疫防线之时，各国人民天下一家、安危与共的认识不断加深。无论是来自全球“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祝福，还是印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捐赠抗疫物资，以及“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诗意回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不同形式的展现和表达。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高度上得到了弘扬光大，获得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和支持。

“至暗时刻”，人们尤其渴望黎明。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生命本质质量”，将不同地域、文化、种族、阶层的人关联到一起。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大时代呼唤大智慧。历史终将证明，唯有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秉持同舟共济的大智慧，抛弃地缘政治的小算盘，团结协作、携手应对，我们才能最终战胜重重险阻，维护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家园。



中华文明史很长，人类文明史更长，从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变局。当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发展历史进程的“分水岭”味道似乎越来越浓：有些事物在加快变化，并在变化中不断引发更多新的变化，有些事物的变化则在趋缓。对此，我们要想有清楚的认识，就必须把握住那些决定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变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哪些变量是根本之变

从时空维度来看，对某种社会存在的解释，要么是沿空间横轴进行时空横切面的分析，要么是沿历史纵轴进行时空纵切面的分析。要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更应该采用后一种分析思路和框架。

我们要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解读出其中基础性变量的内在运动机理，还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分析路径上来。能够主导人类社会百年以上长时段发展演进的，是人类个体需要倾注数十年时间努力的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分化和深化，以及由此形成并可在代际之间传承发展的知识的不断创新创造。能够主导人类社会百年以上长时段发展演进的，还有与专业化分工相伴相生、互为依托的制度创新。

概言之，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够引发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大基础变量。历史反复证明，知识的累积创新绝不是个“快变量”。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科学突破取得之初，总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准确预判到它们对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和巨大价值，那些摘取科学皇冠的“巨人”们无不是人类纯真求索意识和无畏攀登精神的典范。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历史演进中看到，制度创新更不是个“快变量”，它一直都贯穿在人类社会知识、技术、产业、经济等演进变革的进程中，这是制度史演进的常态。这也决定了其创新步伐必然要滞后于知识的创新。

当下的快与慢

要搞清楚现今人类社会的演进是在加快还是趋缓，我们必须把当下的变化投影到历史的时空坐标体系中，屏蔽掉那些快变量的喧嚣，看那些基础性变量的变化是加快了，还是变慢了。

对于追赶者来说，因为有领跑者作为标杆和路径指引，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学习领跑者业已探索成熟的知识技术和制度成果，所以其在同一发展阶段的进步速度有可能快于领跑者，并表现出跨越式的追赶态势，这应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对于某个追赶中的具体国家来说，要想成为这样的必然，是有限定条件的，也就是要在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立足自我成为一个因地制宜的创新者。

对于领跑者来说，前行是漫漫无人区，外部的约束条件、前行的最佳目标和最优路径等一切又重归未知，需要重回原点仰望星空、基于前人肩膀跨越式苦苦求索。因此，领跑的进步更可能是缓慢而非快速的、是突变而非连续的，其前行缓慢之常态、快速之偶然，也是一种历史必然。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要实现真正的复兴，必然会在追赶式发展到极致时，开始进入到这个阶段，开始越来越多地面临领跑者的探索与艰辛。

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在全球占据领跑地位的，也必然是它在那些基础变量上的积淀与表现。哪个国家或民族在知识创新、制度创新这两大基础变量的演进中掌控了全球的引领权，则必然会在历史长周期的竞争中实现领跑。而评判某一时期人类社会演进是在加快，还是在趋缓，也必须要到在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中领跑的国家或地区去寻求答案。

首先，可以从知识创新角度进行观察。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全球科学中心先是在欧洲流转，从英国到法国，再到德国，20世纪上半叶受两次世界大战影响才转到美国，并一直延续至今。21世纪以来，很多新生的技术、产品、业态、模式不断涌现、持续变革，世界科技产业领域也是十分激荡和喧嚣。但从知识创新的历史发展主脉来看，当下主要还是在享用着20世纪科学发展的红利。不过，随着分工更主要地在知识创新领域深化演进，可以预见人类社会的知识创新可能又将迎来一个加速发展时期。展望未来全球的知识创新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是，中国已经从一个追赶者，转变为一个积极迅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参与者和领跑者。这是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的重要理由。

其次，可以从制度创新角度进行观察。人类社会一直在缓慢而突变地发展着。特别是在15世纪后，随着全球地理大发现和海上贸易争夺的逐步深化，地球对于人类而言，已越来越不再是边界无限的时空，而是边界给定的有限时空。早期的零和博弈发展模式也逐步进化为合作博弈发展模式。也许我们可以把两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促成这一转化的突破性诱发因素，把随后发展出来的经济全球化当作是新模式的开端。

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社会就如何保护交通运输链的安全、维护贸易网络的安全以及后续衍生的产业供应链的安全，从早期的暴力对抗模式，到谋划构建中的法制化、协商共治化的全球治理新模式，经历了数百年的制度探索和创新。制度具有跨越百年的长久生命力，必然是交易各方长期博弈的产物，是合作博弈的产物。

在当下，中国的参与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需。我们长期共存于此，这里接续的百年纷争，也必然是连续性的博弈，而非一次性的博弈。在此过程中，必然需要一个新的合作共赢的时空。为此作出贡献，正是中国所应肩负的关键而又独特的历史使命。

拥抱“慢时代”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大变局往往要持续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清主脉、窥见全貌。

孔子与苏格拉底不可能直接对话，那是因为万水千山的遥遥阻隔。但山水无法阻断他们思想超越代际、跨越时空的传承。这些传承，融入并不断丰富着人类社会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因，引导着各大文明体最终穿越山水阻隔，开始认识对方，再到

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变量

□ 樊志宏

交往交融。虽缓慢，但持久；虽时常伴随着血和泪，但更多是进步与光明。我们越来越有可能迎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共叙历史、共议当下、共谋未来。

如何才能迎来、又该如何迎接这样的盛景呢？

似乎唯有在诸多基础性变量方面，让不同的大文明体之间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交集、合集，让越来越多的全球性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成为各大文明体之间合作的产物，让全人类思想智慧在统一的时空中交融碰撞再传承创新，才能让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文明纪元。

迎接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和文明体来说，需要做的可能就是在这一关键时点上，沉静下来、从容起来，认真思索与求索如何向那些基础领域发力，以更多的科学和人文精神，投身到基础研究中，投身到厚积进步动能的基础教育中，投身到能够不断激发促进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各类制度创新和人文思想进步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持重前行、厚积薄发。

